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Research Methods

Cheng Lv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89, China

Email: bluebard@126.com

Abstract: Recently,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rethink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anagement, and, meanwhile, a heated debate has been initiated. In the first place, 4 dimensions of research will b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n, based on thes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research, this paper will divided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anagement into 4 parts. Finally,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inner logic will be demonstrated, and the system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anagement will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Chinese Management; System of research methods; Dimension of research; Characteristic of research; Inner logic

再议“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问题 ——一个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

吕 成

南京大学哲学系, 南京 210089, 中国

Email: bluebard@126.com

摘 要:近年来, 学界针对“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并掀起了相关问题的讨论。本文首先提出了当前该领域存在的四大基本研究维度, 并据此对该领域研究方法进行划分。然后, 通过对各类研究方法特点的详尽剖析, 厘清各类研究方法间的内在逻辑线索, 从而最终完成了对“管理学在中国”领域中研究方法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 中国式管理; 研究方法体系; 研究维度; 研究特点; 内在逻辑

1 引言

近年来, 关于“中国式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讨论日益增多, 众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虽然, 各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 但在探索“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方法道路上却也达成了较为普遍的一致, 即应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实践问题入手, 通过定量、定性的多元化研究方法手段进行客观的研究, 并最终达到构建理论体系、检验理论体系的目的。然而,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 各类研究方法间迥异的研究维度与研究特点, 导致了每类研究方法具体侧重点与研究意义的不同, 甚至相互矛盾。由此, 便引出了如下几个极为重要

的问题, 即各类研究方法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 研究者应如何处理好各种研究方法彼此间的关系, 从而真正实现多元化研究方法并存的和谐局面?

2 讨论前的三点说明

在文章进行具体讨论之前, 笔者应针对如下几点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首先, 笔者将对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以及概念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 以免使读者在理解的过程中产生偏差。正如文章题目所提示, 本文所讨论的核心对象是“中国式管理”领域中的研究方法, 然而该研究对象包含着如下两个概念, 即“中国式管理”与研究方法, 因此, 文章将首先针对上述两个概念进行一个简略但清晰的界定。

第一, 何为“中国式管理”? 关于这一研究领域

本研究受南京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XY101028493)。

的命名学界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众多学者也提出过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譬如“管理学在中国”、“中国管理科学”以及本文所采用的“中国式管理”等。应强调的是，本文并无意就这一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相反，本文更偏向将“中国式管理”（或者其他表述方式）符号化，使其单纯地作为一个修饰词。因此，秉持这样的观点，笔者对本文这个已经符号化的“中国式管理”以及“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泛化的界定。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式管理”是指国内外学者所进行的涉及中国社会情境乃至中国特有文化的管理科学研究。

第二，何为研究方法？笔者此处强调，此研究方法并非具体的、实际操作的研究方法，而文章所做的工作也并非详细探讨该领域各个具体研究方法的特点与优劣，并将它们逐一归纳、分类。相反，文章试图通过从宏观的角度对该领域研究方法体系进行系统的把握与理解。应承认“研究方法体系”这一概念并非笔者原创，崔援民在阐述“现代管理方法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时，曾间接的对“研究方法体系”进行过定义。崔援民认为“‘现代管理方法论’要研究的，不是管理的全过程，而是介于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之间的方法系统。而且，该学科要研究的着眼点不是某一个具体方法，而是整个方法体系；不是探究某一方法的具体应用，而是研究这些方法的升华、提高和外推”^[1]。本文将要展开讨论的对象并非一个个具体的研究方法抑或手段，而是一个由各类具体研究方法所组成的整体，这便是上文所述的“方法体系”。

其次，本文将通过所提出的四类研究维度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划分，但应强调这种基于研究维度对研究方法体系所做的划分，并不意味着每类研究方法只包含着某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相反，每类研究方法中可能包含着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则恰恰是此类划分的标准，即基于研究维度的划分，抑或说是基于研究方法的逻辑视角，而非基于具体研究方法自身特点的划分。

最后，我们应明确针对“中国式管理”这一领域所进行探索研究的并非只有中国学者，也并非只发生于中国境内。国际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明确提出，基于美国乃至西方情境下的管理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解释性。在面对中国特殊情境下的管理学问题时，Boyacigiller 等就曾提出

了“基于北美洲情境下所诞生的管理学理论与研究工具是否具有充分的解释性”^[2]这一疑问，而 Doktor 等^[3]则更为直接的指明诞生于西方的“管理理论与研究工具并不具有他们所相信的高度解释性与普遍适用性”，因为“它们无法完整、彻底的解释与预测迥异于西方环境下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纷纷致力于“中国式管理”（其表述可能并非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

3 微观层面的解构

3.1 四类研究维度的划分

在简要说明了上述三点问题之后，文章将正式进入该领域四类研究维度的论述与探讨。首先，通过阅读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外国研究者更多的是将中国视为“一片肥沃的土壤，它既可以发展出新型的组织、管理理论，也可以验证已存在的、基于西方情境下的理论是否具有有效性”^[4]。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际学界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研究道路，即探索“中国式的管理理论（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5]与“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5]这两大类研究趋向。对于这两条研究道路的区别，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分辨出来，“中国式的管理理论（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它是基于中国特有社会环境下所提出的不同于西方已有管理理论的新型组织、管理理论；而与此相反，“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则是将中国视为检验西方已有管理理论是否有效的试验田，其研究客体仍为西方已有的管理理论，而并未生发出新型的有别于西方的组织、管理理论。

正是外国学者在进行“中国式管理”研究的过程中所表现出上述两大类趋向，帮助我们形成了划分该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两个重要的研究维度，即“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维度与“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

在从国际学界的视角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维度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内对“中国式管理”领域所做的研究，并分析其所特有的研究维度。国内“中国式管理”领域所进行的研究，显著区别于国际学界的一点在于，众多学者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抑或中国古代先哲智慧视为其重要的理论来源。正如彭贺^[6]所强调的，“东方管理应注重对东方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精髓的提炼和继承”、“对中国传统文

化精髓的研究是进行（管理科学）本土框架建构的基石”。的确，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核心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的一大理论基石，而这恰恰是西方管理科学所没有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地概括：国内“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具有一个明显倾向，即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系统地梳理，试图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管理思想。这便形成了“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第三个研究维度，即极具中国特色的“基于文本文献”的维度。

国内“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除了具有上述回归传统典籍的研究趋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明显趋向性，即依赖于哲学思辨进行体系化的建构。针对这一点，以谭劲松^[7]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目前一些研究仍然单纯采用所谓‘思辨’的方法，没有更多地综合实证、实验、演绎等科学方法”，从而“造成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研究结论经不起推敲，缺少科学性”的局面。诚然，当前国内“中国式管理”领域涌现出了众多标新立异、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但正是由于国内部分学者过分追求“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的一步到位，而忽略了现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检验，并最终转向形而上学的建构。当然，笔者此处并不否认一些理论体系的确存在着其现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证明，只是同其体系的宏大规模相比，这些面向现实的探究是远远不够的。综上所述，正是国内学界这一极具特色的研究趋向，帮助我们形成了最后一个研究维度，即“基于哲学思辨”的维度。

通过对国际学界与国内学界针对“中国式管理”这一领域所做研究的分析，笔者最后提出下述四个研究维度，即“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维度、“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基于文本文献”的维度以及“基于哲学思辨”的维度。基于此四个研究维度，下文将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划分，并进行相关的阐述。

3.2 “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维度

笔者认为，正如其名称所述，基于这一维度的研究方法，其在执行过程中所始终秉持的主要原则是将西方已存的管理学理论置于中国情境下进行讨论，而这里应指出的是，这“置”的过程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将西方管理学理论置于中国特有的“语言情境”之下。我们不能否认，正如罗纪宁^[8]

所言，这种研究路径“盲目地把西方系统科学的数理方法和管理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系统哲学作机械性粘贴”，其所得到的理论结论无非“内核是西方各学派的管理理念，外表是中国儒道和诸子百家的术语”；第二条路径则是将西方管理学理论置于中国特有的“现实情境”之下。相比较“换包装”般的第一条路径而言，这种将西方管理学理论置于中国“现实情境”下的研究路径看似更具合理性与现实性（这里应指明的是，此类研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面向中国特殊现实的“情境嵌入式研究”，而主要差别表现在“情境嵌入式研究”是在面向中国特殊现实的基础上，形成区别于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式管理”理论，而文中所述的路径是将西方管理学已存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之中，已验证该理论是否仍具可行性，并对其进行扩展、深化），然而对于这一路径的看法，国内外学者多抱以悲观的态度，彭贺就在多篇文章中表示，不希望中国特色管理学“为他人做注脚”^[6]抑或“跟着西方学者后面做拾人牙慧的事情”^[9]。而 Barney 等^[5]则评价这类研究为“将已建立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情境下”，而且，Barney 等人拒绝承认通过此类研究途径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的管理理论（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而称其为“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基于对该类研究方法的“双重路径”特性的阐释，笔者这里还要指出基于该维度的研究方法的另一重要特征，即“双重断裂性”。由于该类研究方法其一路径是将西方管理理论置于中国“语言情境”之下，并对其进行“中国语言的包装”，所以，其必将导致的结果是研究者为了迎合西方管理理论，抑或是为了更好的为西方管理理论“量体裁衣”，将中国传统思想整而化零，并依据西方管理体系，对中国古代各派学说，甚至各派学说中的思想断片逐条排查。而当这些思想断片与西方管理体系相吻合，或者存在解释关系时，“中国式管理”思想便诞生了。笔者称其为第一重断裂，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知识的断裂”。而第二重断裂则是基于另一路径所产生的，即西方管理理论被置于中国“现实情境”下。研究者似乎为了证实西方管理理论并非具有普适性，抑或是为了维护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而进一步肯定“中国式管理”的价值与存在的必然性，因此，研究者更倾向于选用西方管理科学的部分理论来对中国特殊的情境进行探讨，而非将西方管理科学整体的移植。Barney 等

^[5]就曾罗列出得到“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的这类研究方法所常用的必要、先决、已存的西方管理理论,即“组织行为学、组织理论、决策管理以及跨国公司”。而正是这对西方管理科学的选择性利用,是笔者所称的第二重断裂,即“管理理论体系的断裂”。

3.3 “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

笔者认为,若以“基于现实实践”这一维度对该领域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划分,则可以涵盖相当数量的研究方法,这其中既包括已存的诸如量化、案例研究方法,亦包括近年来,众多学者所进行深入挖掘的、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譬如“以问题为中心”、“情境嵌入式”,等等。正如笔者上文所描述的,当前,学界对如何推动、促进“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发展这一问题几乎已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并形成了一股潮流,即“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方法应将研究者引向中国现实,而非西方管理理论抑或古代典籍。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可以通过王学秀所撰写的《“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概念、问题与方向——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评述》^[10]一文窥豹一斑。与会的各位学者纷纷就“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趋向与研究方法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国式管理”是否应该“基于西方管理科学”这一维度进行研究,“郭重庆院士在讲话中认为,中国管理学的创建要从对西方管理经典的‘照着说’,到向中国管理的‘接着讲’转变”;面对“中国式管理”研究是否应“基于文献考究”这一维度进行研究,王学秀本人则认为“由于传统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钳制,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界多“考据”和“阐释”,少见‘经世济用’之学”;而对于“中国式管理”是否应基于纯粹的抽象哲学思辨,罗珉教授认为,正是这种运用“‘先验的’、‘内省的’思维去进行抽象研究的传统”的“思维惯性”,阻碍了“管理学研究向实证方法转变”。基于这种论调,与会学者郭重庆院士、罗珉教授、李垣教授等人都呼吁中国管理学“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抑或“基于中国情境”,而韩巍副教授则更为直接的提出管理科学的“社会学转向”。

正如上文所述,笔者认为,“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不仅为数众多,而且种类繁多,其中既包括已被西方学者所广泛采用的定量、定性、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也包括在这股“方法论探索、革新”

的浪潮下涌现出的新型研究方法。然而,苏勇、于保平^[11]二人曾针对国内该领域近十余年来所刊登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数据分析工作。通过苏、于二人所得出的分析数据(案例分析,1篇;二手材料、数据,8篇;访谈调查,1篇;内容分析,93篇;问卷调查,1篇),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当前该领域涌现出如此繁多的研究方法,但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抑或说只是众多研究者的“模型概念”。这些研究方法并未被众多研究者所采用,更不用说进行现实的研究工作。反观西方各学者近年来从中国文化的视角对企业管理活动的研究,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出国内“中国式管理”的研究现状同西方管理学界所存在的差距。Bruton等^[12]认为“基于亚洲管理活动的研究”(Asian Management research)由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特殊的情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管理学研究领域现存的理论范式(paradigms)”。针对该领域所存在的研究方法问题,Bruton等基于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指出了“基于现实调查的量化数据分析方法仍是主流,而没有应用量化统计的定性研究方法仍占少数”。通过Bruton等所做的数据统计,我们也可以直观的认识,在国际刊物上刊登的该领域文章,运用量化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章共计247篇,而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得出结论的文章共计33篇,而运用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文章则为15篇。比较上述两组数字,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同国际学界所存在的差距。而正是由于国内研究方法的不明确,导致了 we 陷入了一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尴尬处境。这即表现在管理理论同管理实践的脱节,也表现在“理想化”的研究方法与现实研究过程的脱节,更表现在国内学界同国际学界的脱节。而这也正是国内一批学者所积极呼吁“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需要规范化、国际化,需要遵循国际通用的问卷、统计和实验方法”^[13]的原因。

3.4 “基于文本文献”的维度

当前“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中,不可否认“基于文本文献”这一维度的研究方法乃一大主流,但其存在的问题也相当明显。随着“中国式管理”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众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并希望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更为全面的“中国式管理”思想。由此,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学者历数中国数千年所产生的思想

家们，从中汲取涉及到管理科学的思想，并对其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进行系统的整理。对于基于这一维度的研究方法，彭贺曾指出其所存在的四种研究取向，即“‘六经注我’式研究”、“‘我注六经’式研究”、“梳理式研究”以及“考古式研究”^[14]。而且尹卫东也表示此类研究方法对于“总体回顾、深刻反思管理思想演变的工作显得尤为薄弱，大都停留在简单介绍管理学家的生平著作和理论观点的层次”^[15]上。诚然，此类研究方法正如各位学者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种种问题，譬如强烈的主观性以及过于重视文本的表面、孤立挖掘，即忽略了现实意义，也忽略了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在当前这一研究领域中，这类研究方法仍被众多学者所广泛采用。众多学者通过此类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整理，并试图最终得出体系化的“中国式管理”理论知识，这一理论知识体系笔者称之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这里应指明的一点是，此体系化理论并非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而是基于“文本挖掘”所形成的理论知识体系。

笔者认为，这类研究方法虽然摆脱了西方管理科学体系的束缚，但又过分迷恋于中国传统思想，从而忽略针对现实的研究。这类学者大多奉行“古为今用”的主张，并在此信念之下历数中国历史中所涌现出的众多思想家、名著、名言，并从众多古籍中汲取出能为企业管理活动所用的管理学思想。当然，将此类研究方法发挥到极致的，当属由苏东水教授所主编的《中国管理通鉴》^[16]。该书从技巧、人物、著作以及名言等角度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此类研究方法拓宽了“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范围以及相关研究者的研究视域，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中适用于企业管理活动的管理思想也被众多研究者所进一步的深入挖掘与探讨，并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从而推动了“中国式管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5 “基于哲学思辨”的维度

正如马庆国所言“在管理与其他社科领域，我国大多数论文的主流研究方法，还陷于总结性的、思辨性的方法”^[13]，而笔者所言的第四个基本维度，“基于哲学建构”的维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得出的。这里应当承认的是，当前，通过这类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最为丰富的。譬如，成中英的C理论^[17]、

曾仕强的M理论^[18]、苏东水的东方管理理论^[19]、席酉民的和谐理论^[20]等。笔者认为，此类“基于哲学建构”维度的研究方法摒弃了为西方管理科学体系“做注脚”以及对古典文献进行“考古式”的工作，并最终形成了众多的“中国式管理”学派与相应的理论学说。当然，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式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成就。然而，这些理论体系虽然庞大恢弘，但由于极度缺乏现实实践的充分支撑、检验，使得此类研究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形上的哲学思辨建构，并逐渐成为研究者头脑中的“思维游戏”。

针对上述诸多“中国式管理”学派以及学说所进行论述、阐释的文章不计其数，本文这里便不一一引用，但通过阅读、理解，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学者都是热衷于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具有高度开阔性以及高度解释性的抽象中国式管理体系。而对于这种中国式管理体系与西方科学管理体系之关系这一问题上，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承认两者的差异性，并强调两者的互补性，正如苏东水教授所言，“西方管理原创与东方管理文化具有互补性，而且，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已成必然趋势，东方管理的人本思想与西方管理的科学思想互补互融是推动管理学创新和发展的正确途径”^[21]。曾仕强也在其《中国式管理》一书中对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性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由于各地区具有不相同的风土人情，表示各地区的哲学并不相同，管理必须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才能增强效果，所以各地区的管理哲学也不一样”^[22]。同时，曾仕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管理哲学结合西方管理科学得以发扬的时代，两者缺一，都将跛脚难行”^[23]。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这类“基于哲学建构”维度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诸多中国式管理体系是独立于西方管理体系的一种抽象的“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并且期望能同西方管理科学体系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共同促进管理学的发展。

4 宏观层面的建构

上文已从四个基本维度，即“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维度、“基于文献考究”的维度、“基于哲学建构”的维度以及“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将国内“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进行了再划分，并由此形成了基于不同研究维度、不同研究趋向的四类研究方法。为了厘清各类研究方法间的逻辑关系，并最终

实现“中国式管理”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整体性构化，下文将从两组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别对四类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详尽比较剖析。

4.1 两组分析视角的阐释

艾尔·巴比曾在《社会研究方法》一书中，对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如下简明的定义，即“社会科学家是如何解答人类社会生活的”^[24]。通过这个简明的定义，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由三个核心部分所组成的，其一是“如何解答”（研究方法其自身），其二是“社会科学家”（研究者），其三是“人类社会生活”（研究对象）。很显然，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管理学科，其研究方法亦具有上述简单的特征。因此，笔者基于上述对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认识，将分别从两组视角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分析，即“研究方法其自身”的视角（笔者将“研究对象”归入此视角之中）与“研究者”的视角。

4.2 “研究方法其自身”的视角

由于“基于研究方法其自身”的视角所强调的是研究方法其本身所具备的特点，因此笔者又将该视角细化为如下三点，即研究对象的特点，研究过程中具体研究手段的特点以及待形成研究结论的特点。

4.2.1 研究对象

笔者认为，“基于西方管理科学”这一维度的研究方法所始终秉持的主要原则是将西方已存的管理学理论置于中国情境下进行讨论，而这“置”的过程则具体表现为“双重路径”。鉴于其“双重路径”的特性，“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必然具有两类研究对象的。其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典籍中所蕴含的观点、名言，又如罗纪宁所言，选取此路径的研究者只需明确“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如何如何，中国古代有哪些观点与之对应”^[25]，最后则凭借已存的西方管理理论赋予中国古代语言以管理学的新含义。其二则是当代中国特殊情境下所产生的管理现象。对于这一路径的研究，Barney等^[5]曾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Barney等认为虽然这种“‘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可以为研究者指明一条清晰的研究路径，并且可以通过‘借鉴并发展’的途径扩展、深化已存的西方管理理论”，但同时，该研究路径所存在的问题同样突出，即“中国学者的研究日程表必将由西方学者所做的前期工作所决定”，而且Barney等亦承认“理解中国管理界独

特现象的最优方法，绝非是基于西方经验所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

吕力曾对“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吕力^[26]认为该类研究方法“大量的工作在厘清古代管理的思想、原则、宗旨以及对这些素材做出当下的解读”，而其“着力点在挖掘思想、解释思想，其最高成就在成就一个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体系”。而苏勇、于保平二人则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认为“东方管理的研究方法大多局限在经典文献中治国策略、君子修己安人模式的整理”^[11]。如此看来，该类研究方法的研究对象则相对单一，即以古代典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思想。运用此类研究方法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入挖掘，总结归纳出适用于当今管理活动的名言、警句、技巧抑或思想观点，并最终形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当然这种单纯基于文本文献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极为显著的问题，王学秀就曾指出“以文化典籍为基础的研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27]，笔者认为，这不确定中即存在王学秀所言的“文化变迁性”，也存在着脱离现实的抽象归纳性。

对“基于哲学思辨”这一维度的研究方法，我们不得不承认，放眼“中国式管理”国内学界，该类研究方法为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并形成了一批以东方管理学理论、和谐管理理论为代表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彭贺就曾指出“东方管理哲学研究是目前东方管理研究领域中最受学者关注、成果最多的领域”^[14]。然而，围绕此类研究方法，我们也可以听到许多批评的声音。韩巍认为“不少‘创新理论’给人形似‘自成体系’疑似‘自说自话’”^[28]。为了准确的判定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算是成熟，韩巍提出了三个关键的判定标准，其中之一便是“是否与经验相一致”^[28]。在笔者看来，韩巍之所提出这一判定标准，其根本目的在于界定生成该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究竟是直面现实实践的，还是通过哲学思辨建构的，简而言之便是其研究对象是抽象还是具象问题。韩巍据此判定标准，对当今在“中国式管理”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和谐观理、东方管理理论以及和合管理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对东方管理理论、和合管理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是建立在“‘善意’的空中楼阁里的”^[28]。当然，彭贺也就东方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同韩巍进行了争论，彭贺指出东方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乡镇企业、地区经济

发展和管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调研、思考和研究”^[29]之后所得出的,并强调了东方管理学的两个研究对象,即“东方优秀管理文化精髓”^[15]与“东方诸国管理思想和实践”^[15]。基于上述针对东方管理学的讨论,笔者可以判定,此类“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虽然其研究过程呈现出一种脱离现实建构理论体系的态势,但从其研究对象来分析,此类研究方法则具有两个研究对象,一是抽象的中国传统思想,二则是相对具象化的特殊中国管理实践活动。

“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虽然近年来为众多学者所提及、建议,但通过苏勇、于保平二人的数据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此类研究方法目前仍未被广泛采用。笔者认为,虽然此类研究方法包含着以案例分析、量化分析以及情景嵌入式研究等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但其着眼点是一致的,即“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应面向中国的现实。因此,基于对实证主义的此类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只可能为现实、以及现实存在的实践。

4.2.2 研究过程

对于“基于西方管理科学”这一维度的研究方法,笔者仍想基于其“双重路径”的特性对其研究过程进行分析。若将西方管理科学置于“中国语言情境”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就是“匹配”并“粘贴”,最后形成被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包装过的西方管理体系。反观另一路径,若将西方管理科学置于“中国现实情境中”,笔者认为此路径在研究过程所表现出的具体研究手段与西方管理科学无疑,即通过实证主义各类研究手段,检验西方管理理论是否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并且基于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对该理论进行适当的拓展、深化。但就笔者看来,最终拓展、深化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绝非“中国式管理”理论。而且,笔者甚至认为,经过中国(抑或东方其他国家)特殊情境“加工”过的西方管理理论甚至不可称之为西方管理理论,而是一种脱离了理论生成特殊背景,并具有极为广泛适用性的终极理论体系。且不论此理论是否可建构,但若真能形成如此理论,倒也算是中国(抑或东方诸国)对管理学界的卓越贡献。

“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过程则相对纯粹一些,众多学者对其亦多有描述,其中,彭贺在多篇文章中将其称之为“考古式”的研究方法;韩巍、吕力则将这种“文献梳理式”的研究方法划归为“人文

主义研究方法”,并从“研究方法应多元化”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批判。韩巍^[30]认为这种对“经书和注经式”抑或对“子曰”的研究并未能“充分体现管理之‘本土化特色’”;而吕力^[26]则强调,这类基于文献梳理的研究方法离开了“当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成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基于文本文献”这一维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通过“考古式”的挖掘,抑或“注经式”的赋予内涵,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现代管理意义上的再阐释。

“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正是凭借其强大的哲学思辨能力,使研究者建构出为数众多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然而正如罗珉所言,此类研究者“过分强调抽象研究方法”,所建构的“理论得不到管理实践的有力支撑,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中国管理理论走进了自己精心构筑的象牙塔,成为一种抽象研究方法制造出来的逻辑精品”^[31],而罗纪宁则更为直接的称此类研究“大多停留在概念体系构建和原则阐释上,缺乏可操作性,离实际应用有相当距离”^[8],因而大多数“是没有意义的智力游戏”^[8]。由于“中国式管理”学界急于得到国际的认可,并迫切希望拥有平等的地位以期同西方管理科学理论进行沟通、对话,因而,尽快建立一个体系化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成为各研究者,乃至学界的首要目标。然而,又由于缺乏长期足够的客观实践经验作为理论支撑,因此,只得将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诉诸于抽象的哲学层面,并通过形上的哲学建构,达到形成体系化的“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目的。

“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由于是面向现实进行调查研究的,应而其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研究手段种类繁多,但仍可被清晰地把握。这其中既包括量化、案例分析等传统的研究手段,也包括近年来学者所提出的诸如情境嵌入式等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

4.2.3 研究结论

由于各类研究方法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过程所表现出的具体手段各不相同,因此,各类研究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者引向不同的研究结论,而笔者将以是否建立体系化的“中国式管理理论(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为标准对四类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由于其自身“双重路径”所导致,使其研究结论陷入了“双重断裂”的窘境,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断

裂”与“管理理论体系的断裂”。正是由于此类研究方法具有“双重断裂”的特性，从而导致了由此类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相对独立的，这即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断片似的理解与阐释，也表现为“中国式管理”领域理论体系的缺失。纵然此类研究方法存在扩展、深化西方已存管理理论的可能，但而对于形成有效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这一目标，显然通过该方法所无法达到的。

“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正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断裂”进行了体系化的建构。通过对古代典籍的系统整理，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蕴含的管理学思想形成了体系化的知识理论。但由于该理论体系既缺乏现实实践的有效支持，也缺乏现实实践的检验，因而仅仅是研究者在思维空间中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现代管理学的系统再阐释，因而笔者姑且称之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

“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则针对“管理理论体系的断裂”进行了体系化的建构。此类研究方法将“对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的研究”，作为“中国管理研究的起点”[9]，但绝“非终点”[9]，与此同时，运用该方法的部分学者又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亦

是基于对现实实践活动的研究归纳。笔者先不质疑是否每个“精巧”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都经历过对现实实践研究归纳这一环节，但此类“中国式管理”的理论体系有待实践的检验却是在学界达成一致共识的。彭贺曾承认当今为数众多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尚未得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充分’经验支持”[29]。因此，笔者称此类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

“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则强调“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应直面中国的现实，这既包括对中国特有管理现象的解释，也包括对中国特有管理问题的探讨。相比较上述研究方法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国传统思想之上，此类研究方法更关心对中国现实实践的认识与把握，并期望以经验总结代替逻辑思辨、文献挖掘，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虽然此类研究方法当前并未被国内学者所普遍运用，但我们可以预见到此类研究方法将肩负“中国式管理”待存理论的建立与“中国式管理”已存理论的检验这两重任务。

上文已分别从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以及研究结论三个角度对四类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形成了表1。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method in itself
表 1. “研究方法其自身”视角下的对比分析

基于研究方法其自身的维度	研究对象		研究过程		研究结论	
	研究对象	具象抽象	具体手段	空间性	规模	意义
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维度	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现实、西方管理科学	具象、抽象	粘贴、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思维空间 现实空间	独立	检验
基于文本文献的维度	中国传统思想	抽象	考古式、注经式	思维空间	体系	建立
基于哲学思辨的维度	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现实	具象、抽象	现实调查、哲学思辨建构	思维空间 现实空间	体系	建立
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	中国现实	具象	以量化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	现实空间	体系	建立、 检验

通过表1的概括，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各类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特点。“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由于具有“双重路径”性，在研究对象上则表现为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现实两方面。其具体的研究手段亦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通过机械的匹配、粘贴为西方管理科学披上中国语言的外衣，二是运用与西方管

理科学研究无异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检验已存的西方管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现实，并试图对其进行适当的发展。而其研究结论同样受到“双重断裂性”的影响，在规模上则呈现相对独立的势态，并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

“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对象

是以中国古代典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者通过“考古式”、“注经式”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式管理”知识层面的体系化理论，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

“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由于其将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现实同时视为其研究对象，（且不论两者孰重孰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其所呈现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既包括针对现实实践的研究，也包括逻辑思辨与哲学建构，并最终通过缜密的思考、强大的思维能力，构筑了庞大的“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

最后，“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强调的是中国现实问题与特殊管理行为活动在“中国式管理”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并视其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在具体的研究手段上，此类研究方法更倾向于实证主义，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注定为极具信服力的理论体系。

这里应指出的一点是，各类研究方法的划分标准为不同的研究维度，而非指研究过程中的具体研究手段。而这也解释为何基于不同维度的各类研究方法（“基于西方管理科学”与“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在操作层面上出现了相同的具体研究手段。

表 1 不仅罗列了上文已论述的各类研究方法特点，而且还依据特点的性质进行了必要的归纳与概括。其中包括将研究对象进行了具象化、抽象化的区分；对研究过程所依赖的空间进行了思维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划分；以及对所形成理论意义的划分。碍于篇幅，此处只提及一点，以免引起误会。即“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意义表现为检验，应指出的是，此类研究方法所检验的对象是西方已存的管理科学理论，而非“中国式管理”理论；与之相反的是，“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所检验的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中所蕴含的诸多“中国式管理”理论。

4.3 “研究者”的视角

在结束对“研究方法其自身”特点的阐述之后，文章将从“基于研究者”的视角对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思·D·贝利所指出，“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是他所正在研究的现象

的参与者，而社会科学家则是”[32]。社会科学家“自身在研究现象之中，因此，研究者必然会把自己的知识、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带进认识过程”[32]，因此“很难具有客观性”[32]。基于此认识，笔者将从研究者“主观介入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据表 1，我们可以清楚、明确的认定，“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是主观介入性最强的一类研究方法。因为我们得知，该类研究方法不仅研究对象为抽象的中国思想，而且研究的过程是基于思维空间进行并得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较为轻易地判定此类研究具有最强的主观介入性。

其次，“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亦具有较强的主观介入性。虽然此类研究方法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抽象化的中国传统思想与具象化的中国现实。然而，在面对着诸多庞大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时，具象化的中国现实所起到的作用则显得极度匮乏，这不仅体现在无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体现在无法证实或者证伪如此繁杂的理论体系。因此，当前选取此类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们，其所做的工作无非是通过缜密的逻辑与抽象的思辨构筑形上的“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很显然，这种缺乏大量客观实践经验支撑与检验的研究结论仍属于研究者依赖其主观美好愿望所建构的“逻辑精品”。

再次，正如上述所述，“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由于自身的“双重路径”性，导致了其研究过程即可发生于思维空间，亦可发生于现实空间之中。当研究者选取此类研究方法中“语言路径”时，会呈现出强烈的主观介入性，即将西方管理理论同中国传统思想、名言等相匹配、粘贴；但经由“现实路径”的此类研究方法又因为面向现实的研究取向，而存在着相对的客观性。然而与“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此类研究方法并未建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而且，其研究结论彼此间出相对独立，因此，此类研究方法并不需要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反，由此可见，其主观介入程度略弱于前文所述的两类研究方法。

最后，很显然，“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其主观介入性程度最低。此类研究方法的研究对象为绝对客观的中国现实。而且，其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体研究手段更倾向于实证主义，而这也决定了其研究过程必将基于现实空间。因此，综上所述，“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受主观介入性的影

响程度最弱。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从“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到“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主观介入性”由强变弱的趋势，而于此同时，“客观介入性”则呈现出恰恰相反的趋势，即从研究者逐渐摆脱了依赖于主观的研究，转而越来越重视现实与实践，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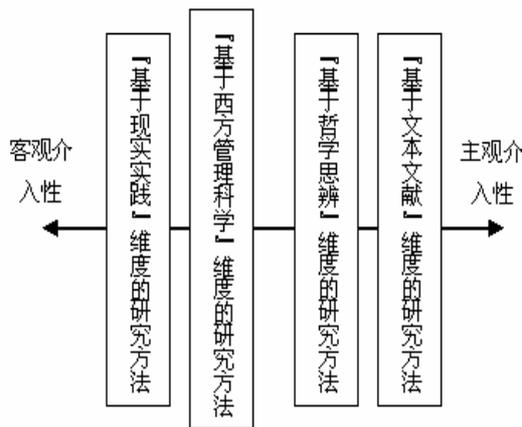


Figur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er

图 1. “研究者”视角下的对比分析

当然，这样的排列顺序并非绝对化的，笔者承认各类研究方法中特例的存在，譬如，我们不能否认当前学界存在着一些通过“哲学思辨”建构出的所谓“中国管理哲学体系”完全缺乏基本的现实研究支撑，而仅仅是研究者主观意识的思维活动。很显然，如此这般的“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其主观介入性程度毫无疑问是最高的。再如，我们也会发现，有些运用“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其研究工作并未涉及中、西文字概念间的拼接，而仅仅是将着眼点放在西方管理科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再应用。对于这样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理由承认其与“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在客观介入性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本文针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主、客观介入性所提出的排列顺序，是一般意义上的考量。图 1 的提出较为全面地考虑了各类研究方法自身的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特例的不存在。相反，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可能会因为其

特殊性冲破此排列顺序，从而产生特例。

5 各研究方法间的内在逻辑

上文已从“研究方法其自身”与“研究者”两个维度，对“中国式管理”领域四类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对上述各类研究方法特点的把握与理解，我们已对各研究方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认识。下文则将厘清各类研究方法间的内在逻辑，从而形成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整体性把握。

5.1 两条逻辑线索

对上述四类研究方法进行内在逻辑层面的分析，将主要基于两条逻辑线索，一是“内在作用性”的逻辑线索，二则是“内在时间性”的逻辑线索。应指明一点，此两条逻辑线索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相反，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譬如，对于“内在时间性”逻辑线索的厘清是基于对“内在作用性”逻辑线索的准确把握；而“内在作用性”逻辑线索则是对“内在时间性”线索的验证。

5.2 “内在作用性”的逻辑线索

为了厘清各类研究方法间的“内在作用性”逻辑线索，首先我们应先对各类研究方法对“中国式管理”领域所产生的作用，即其研究意义进行把握。基于上文对各类研究方法特点的阐述，我们可以分别对四类研究方法进行如下的理解。

正如表 1 所列出的，由“基于西方管理理论”维度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具有检验这一研究意义，而上文也曾提及，此处的“检验”是基于中国独特的情境，对已存的西方管理理论进行检验、修补。又鉴于该类研究方法具有“双重断裂”的特征，即对“中国传统思想”片断式的理解、阐释与对“西方管理理论”片断式的套用、检验。因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运用此类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其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的意义在于尝试将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现实与以西方管理科学为主流的管理科学进行初步的联系，并由此形成了机械的、片断式的、依赖于西方管理理论体系的“中国式管理”知识。

“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人文科学式的研究，进一步挖掘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管理思想。此类“考古式”研究方法，虽然

彻底脱离了现实实践，转而成为管理思想的研究，但我们却不能否认，该类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完成了“中国式管理”领域中“思想史研究”^[15]的体系化。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该研究方法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的作用在于形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

“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亦是基于对中国现实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并形成了诸多“中国式管理”的理论体系。但应指出的是此类研究方法虽将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现实同时视为其研究对象，但目前，此类研究方法显然更为关注思维空间中的逻辑思辨，而非现实空间中的经验支撑与检验。由此看来，该类研究方法的作用在于完成了“中国式管理”领域中的另一类理论体系，即“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彭贺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15]领域。

最后，“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其意义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对中国现实实践的研究建立具有现实经验支撑的中国“管理科学”^[15]理论体系；二是将“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引入现实之中，通过现实的实践检验其科学性；

上文已分别对四类研究方法对“中国式管理”领域所产生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基于此分析，我们便可以相对清晰的厘清该领域各研究方法间的“内在作用性”逻辑。

首先，“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通过已存的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传统思想与管理科学进行了机械式的联系，当然，这样原始、简陋的联系具有诸多的缺陷，譬如上文所提及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断裂”与“管理理论体系的断裂”。而正是由于此类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致使“中国式管理”领域迫切地期望其他类研究方法的出现，以期满足此类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双重断裂”。鉴于“中国式管理”领域所存在的“体系化诉求”与“知识化诉求”，“基于文本文献”与“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此两类研究方法依赖研究者强烈的主观介入性，形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并由此满足了此前该领域所存在的“中国式管理”理论的“体系化诉求”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知识化诉求”。然而，上述三类研究方法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依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即脱离了客观的现实实践与经验，而过于偏重主观的、抽象的建构。而“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正

是针对这一缺陷对“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进行了有效地完善。此类研究方法强调管理学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以期通过直面现实，赋予“中国式管理”领域内已形成的与待形成的各类理论以客观科学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式管理”领域内的四类研究方法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彼此间相互支撑、相互弥补，并由此形成了兼顾抽象与具象、客观现实与主观经验、建立与检验的完整研究方法体系。

5.3 “内在时间性”的逻辑线索

文在阐述四类研究方法间的“内在作用性”逻辑时，以对其“内在时间性”的逻辑线索有所涉及。基于对其“内在作用性”逻辑的把握，我们可以轻易地厘清其“内在逻辑”线索。而这里应指出的一点是，此处所讲的时间是基于逻辑层面的，而非现实层面中的时间。而且，在当前“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中，此四类研究方法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呈现出并存的局面，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进行逻辑层面上的时间性讨论。

首先，从上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具有逻辑先行性。因为此类研究方法以已存的西方管理理论为媒介，赋予了中国传统思想以管理层面的意义，并对中国现实中所存在的独特管理现象与问题进行了西方管理理论式的解读。因此，基于对这种尝试性、片断式、机械联系式研究的认识，我们可以判定此类研究方法在该领域四类研究中居于逻辑层面的起点位置。而正是由于这不完美、充满缺陷的逻辑起点，使“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体系化的诉求”与“知识化的诉求”，从而直接促成了其他研究方法的诞生。

为了满足“中国式管理”领域的“双重诉求”，“基于文本文献”维度与“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诞生了。随之而来的，则是完整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然而，在“中国式管理”领域初步完成了体系化与知识化之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研究者发现，虽然上述两类理论体系具有缜密的逻辑性与严密性，但由于其存在着强烈的主观介入性，因而缺少了现实实践的经验支撑与检验，从而导致了“中国式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针对这一问题，“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被学界广泛的提及。

正是由于“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强调客观现实对建构“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因而，其具备了上述其他三类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特性与作用。此类研究方法即可以通过现实的实践检验“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也可以基于对现实的调查，形成具有现实客观经验支撑，而非主观思维建构的新型“中国式管理”理论。

综上所述，我们厘清了四类研究方法间的“内在的时间性”逻辑线索，即由“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中国式管理”领域的“体系化诉求”与“知识化诉求”。以期满足此两类诉求，“基于文本文献”维度与“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依赖强烈的主观介入性，分别形成了完整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然而，此两类理论体系由于缺乏客观的经验支撑与实践检验，而与管理实践相脱节，针对这一问题，“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则做了有效地补充，从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式管理”研究方法体系。

6 研究方法体系的整体性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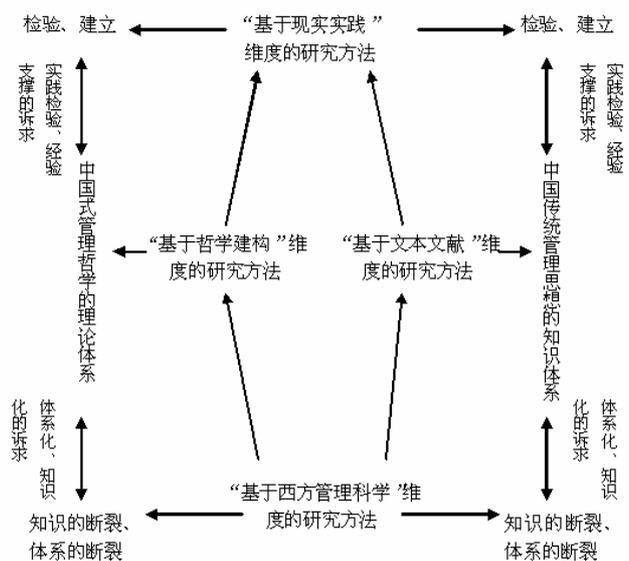
6.1 “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

上文已分别从“内在作用性”与“内在时间性”两条逻辑线索对“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的四类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与联系，至此，我们便可对该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内在逻辑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具体如图2所示。

首先，图2内部反映的是该领域四类研究方法之间的“内在时间性”，即以“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作为逻辑起点，以“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作为逻辑终点，而“基于文本文献”维度与“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则是基于逻辑过程中，不断推进了该领域的发展与深化。

图2外围所反映的则是该领域四类研究方法之间的“内在作用性”，“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以西方管理理论为媒介，首次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现实与管理学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由于此类研究方法自身的缺陷，导致了其在开启“中国式管理”领域研究的同时，也呈现出“双重断裂”。“基于文本文献”维度与“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究方法依赖强烈的主观介入性，形成了“中国传统管理思

想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双重断裂”，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缺乏现实的经验支撑与实践检验。而这已严重问题则最终导致了“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的诞生。此类研究方法由于强调客观现实的重要性，因而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有效地检验，并形成了具有经验支撑的新型“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至此，“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建构完成。



6.2 相关核心问题与说明

正如数理逻辑的开创者、“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所言，“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完成之日，也是这一建筑物的基础倒塌之时”。^[33]诚然，伴随着“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建构完成，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首先，笔者想先就“研究方法”这一概念做如下说明。正如本文开篇所述，本文所探讨的“研究方法”并非具体的，应用于实践层面上的研究方法、手段。相反，本文提出了该领域目前所存在的四大基本研究维度，并据此对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再划分。因此，本文所提及的四类基于不同维度的研究方法更似一个“类概念”，即每一类研究方法间蕴含着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很明显，这其中蕴含着一个从属的层级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 笔者想就几个相对核心的问题进行相关说明。首先, 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否涵盖了该领域所有的具体研究方法? 答案是否定。随着近四十余年“中国式管理”研究的深入, 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先进研究方法、手段被提出, 并被广泛地采用。因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学术探索过程中, 更为新颖的研究方法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因此, 我们可以认定, 本文所构建的“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并非一个僵硬、死板的理论牢笼, 相反, 其是一个可被无限扩展、扩充的动态体系。而这, 恰恰又引出了另一个核心问题, 此研究方法体系是否会有碍于, 甚至限制该领域新型的研究方法、手段的生成?

笔者认为, 正是由于此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上文所述的“类概念”性质, 因此, 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的更新与四类研究维度的相对固定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 彼此互不冲突。由此, 我们可以认定, “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非但不会限制具体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 反而会因得益于新型的具体研究方法, 从而变得更加饱满、充实。

最后,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是否会产生第五研究维度, 甚至更多的研究维度? 笔者认为, 基于不同研究维度的研究方法都在相互的互动中, 展现着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换句话说, 基于不同研究维度的研究方法间存在着互补性的功能, 而这也是该研究方法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因此, 笔者此处并不断然否认其他研究维度存在之可能性, 相反, 笔者愿给出一条判定其合法性的标准, 即基于新式研究维度的研究方法是否同已存的研究维度产生互补性的、良性的互动, 并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

诚如上文所说, 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可被无限扩展、扩充的动态体系, 这既表现在其内部可包含新型的具体研究方法, 也表现在其自身可被不断的超越, 不断的展开。

7 结语

综上纷繁所述, 本文首先基于不同的研究维度, 将“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划分为四类, “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维度的研究方法、“基于文本文献”维度的研究方法、“基于哲学思辨”维度的研

究方法以及“基于现实实践”维度的研究方法。随后, 本文又分别从“研究方法其自身”与“研究者”两个视角对上述四类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并据此厘清了各类研究方法间的内在逻辑线索。至此, 本文完成了对“中国式管理”领域研究方法体系的整体性构化。基于图 2, 我们可以更为清晰的把握如下观点, 即“中国式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四类研究方法并非独立存在的、互无联系的; 相反, 此四类研究方法由于彼此研究维度、研究特点以及研究意义的不同, 呈现出各有分工、相互支撑的局面, 并最终建构了“中国式管理”领域中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

文章的最后, 我想援引 McGrath 的一句话, 我们“不可能完成一项没有缺陷的研究。因为所选择的任何研究方法都存在着其内在的缺陷性, 而任何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必将限制该结论的得出”^[34]。诚如 McGrath 所言, 为了进一步推动管理科学的“中国化”进程, 并促进该研究领域健康的发展,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运用多元化、多维度的研究方法。笔者强烈认为, “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简单的四选一选择题, 每类研究方法都有其特有的研究维度、研究特点与研究意义, 因此, 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理地运用四类研究方法, 使“中国式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充分地发挥其优点, 实现该领域各研究方法相互支撑、研究成果相互支撑、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 从而真正实现为世界管理科学贡献中国智慧的宏伟目标。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1] Cui Yuanmin, the Construc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odern management [J], *China Soft Science*, 1997, (4), P120-122(Ch).
崔援民, 关于建立“现代管理方法论”学科体系的构想[J], *中国软科学*, 1997, (4), P120-122.
- [2] Boyacigiller N, Adler N, the Parochial dinosaur: organizational science in global context [J], *Acad.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2), P262-290.
- [3] Doktor R, Tung R, Von Glinow M A, Future directions for management theory development [J], *Acad.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2), P362-365.
- [4] Li J T, Tsui A S, a Citation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1984-1999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 P87-107.
- [5] Barney J B, Zhang S J,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9, 5(1), P15-28.
- [6] Peng he, Confusion and future: the direction of management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08, (7), P58-61(Ch).

- 彭贺, 困惑与出路: 中国特色管理研究的方向[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 (7), P58-61.
- [7] Tan Jingso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nagement [J], *Management World*, 2007, (1), P 81-91+104(Ch).
谭劲松, 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发展的讨论[J], 管理世界, 2007, (1), P 81-91+104.
- [8] Luo Jining, the Buildup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ts fundamentals and perspectives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2(1), P11-17(Ch).
罗纪宁, 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J], 管理学报, 2005, 2(1), P195-197.
- [9] Peng He, Inspecting Chinese-style management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culture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4(3), P 253-257(Ch).
彭贺, 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J], 管理学报, 2007, 4(3), P253-257.
- [10] Wang Xuexiu, Review of the 1st symposium on 'the Study of Management in China': the conceptions, problems and orientat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5(3), P313-319+365(Ch).
王学秀, “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概念、问题与方向——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评述[J], 管理学报, 2008, 5(3), P313-319+365
- [11] Su Yong, Yu Baoping, Research on Oriental management: theory review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6(12), P 1578-1587(Ch).
苏勇, 于保平, 东方管理研究: 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J], 管理学报, 2009, 6(12), P1578-1587.
- [12] Bruton G D, Lau C M. Asian management research: status today and future outlook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 45(3), P636-659.
- [13] Ma Qingguo, Several crucial problems of the science of Chinese management [J], *Management World*, 2002, (8), P 105-115+140(Ch).
马庆国,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面临的几个关键性问题[J], 管理世界, 2002, (8), P105-115+140.
- [14] Peng He, Research strategies of Oriental management [J], *Academic Monthly*, 2009, (6), P85-92(Ch).
彭贺, 论东方管理的研究策略[J], 学术月刊, 2009, (6), P85-92.
- [15] Yin Weidong, An Outline of the Evolution Management Thought: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J],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02, (2), P48-53+206(Ch).
尹卫东, 哲学视域中的管理思想演变论纲[J], 江海学刊, 2002, (2), P48-53+206.
- [16] Su Dongshui,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as a mirror [M].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3(Ch).
苏东水总主编, 中国管理通鉴[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3.
- [17] Cheng Chungying, Theory C: philosophy of Chinese management [M].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1999, 6(Ch).
成中英, C理论: 中国管理哲学[M].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6.
- [18] Zeng Shiqiang, Chinese-style management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5, 8(Ch).
曾仕强, 中国式管理[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8.
- [19] Su Dongshui, Oriental management [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9(Ch).
苏东水, 东方管理学[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9.
- [20] Xi Youmin, Shang Yufan, Theory of Hexie Management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Ch).
席酉民, 尚玉钊, 和谐管理理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1.
- [21] Su Dongshui, the Fusion and innovation of Western management and Oriental management [J], *Academic Research*, 2002, (5), P39-45(Ch).
苏东水, 论东西方管理的融合与创新[J], 学术研究, 2002, (5), P39-45.
- [22] Geng Guojie, Zeng Shiqiang: Chinese-style management [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7, (1), P189-193(Ch).
耿国阶, 曾仕强: 《中国式管理》[J], 公共管理评论, 2007, (1), P189-193.
- [23] Yu Jiang, Zeng Shiqiang: the Optimum choice in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Western management and Chinese management [J], *New Economy*, 2006, (6), P40-41(Ch).
余江, 曾仕强: 中西管理思路碰撞下的最优选择[J], 新经济, 2006, (6), P40-41.
- [24] Babbie Earl,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ition) [M].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0. 5(Ch).
(美)艾尔·巴比著, 丘泽奇译, 社会研究方法(第8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5
- [25] Luo Jining, Research paradigm and methodology of Chinese management schools [J], *Commercial Research*, 2006, (12), P86-89(Ch).
罗纪宁, 当代中国管理学主要流派、研究范式和方法评析[J], 商业研究, 2006, (12), P86-89.
- [26] Lv Li, Methodology of Chinese management [J], *Economic Tribune*, 2009, (15), P14-15(Ch).
吕力, “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 经济论坛, 2009, (15), P14-15.
- [27] Wang Xuexiu,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he Choice of Chinese Management Value [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06, 27(2), P156-160(Ch).
王学秀, 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管理价值观选择[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6, 27(2), P156-160.
- [28] Han Wei, a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thinking on 'management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5(2), P161-168(Ch).
韩巍, 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J], 管理学报, 2008, (5)2, P161-169.
- [29] Peng He, Review management in China also from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discussion with Han Wei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6(2), P160-164(Ch).
彭贺, 也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J], 管理学报, 2009, (6)2, P160-164.
- [30] Han Wei, Wording and expressions for academic discussions in management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2(4), P386-391(Ch).
韩巍, 学术探讨中的措辞及表达——谈《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J], 管理学报, 2005, 2(4), P386-391.
- [31] Luo Min, Reflection on Chinese manage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5(4), P478-482(Ch).
罗珉, 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J], 管理学报, 2008, 5(4), P478-482(Ch).
- [32] Bailey K 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4th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 [33] Edited by Geachi P and Black M,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2.
- [34] McGrath J, Dilemmas: the study of research choices and dilemma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81, 25(2), P179-211.